

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

唐际根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作者从事考古工作 20 余年, 发表论文 80 余篇。本书从中选取 33 篇, 分为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商研究、铁器与冶金术和文化遗产四个专题。

商研究是作者主要的科研领域, 收录相关文章 18 篇。其中 1993 ~ 2003 年发表的一组 10 篇文章(包括两篇简报)相互关联, 反映了作者围绕“中商文化”展开田野考古活动并最终发现洹北商城的完整思路。文化遗产研究是作者参加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获得成功后拓展的新科研领域。

本书适合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博物馆学等相关专业以及文化遗产等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高校师生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唐际根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2994-6

I. 考… II. 唐… III. ①考古学—文集②文化遗产—文集
IV. K85-53 K1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1451 号

责任编辑: 闫向东 曹明明 / 责任校对: 陈丽珠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封面设计: 唐际根 孔维星 王 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5 1/4

印数: 1—1 500 字数: 592 000

定价: 1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自序

1982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都被分配到38号楼居住。入校第一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年级同学在38号楼门口放了一块专门为新生准备的黑板，上写“欢迎未来的历史学家”。当时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与历史学专业尚未分开设系，在学科归属上，考古学被视为完全从属于历史学。考古学家，当然也就被包括在“未来的历史学家”之中了。当时读起来感觉分外亲切，觉得是高年级同学在鼓励自己。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这层隶属关系，也从此深深地印入脑海，以至后来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和注册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UCL）攻读博士学位时，都会想起这块写有“未来历史学家”的黑板。

我1986年离开北京大学，迄今20余年过去了。这20年间，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虽然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分支，但也有一些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考古学应该从“历史学分支”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的学科，更广阔地服务于社会（见本论文集论文《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以及《立足遗址“核心价值”，大力推广文化景观建设》）。1983年以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考古专业也都从原来的历史系中分出来另立家门。因此我也注定没有成为“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名田野工作者，在考田野古的道路上行走至今。

成为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是快乐的。别的不说，单就参与过考古发掘的地点就足以引起许多人羡慕：广东南海鱿鱼岗、四川彭州竹瓦乡、西藏拉萨曲贡、内蒙赤峰五三乡、河南偃师塔庄、商丘潘庙、虞城马庄、柘城李庄（山台寺）、安阳殷墟。

从事田野活动时间最长的地方仍然是河南。1992年以后，我再没有去过河南以外的其他地点从事过真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1993年，单位领导宣布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负责人”。不过成为“负责人”不久，我即参与张光直、张长寿两先生主持的“豫东计划”去了商丘。安阳考古队的工作仍然由常年在安阳从事田野发掘的前辈学者、著名考古学家杨锡璋先生负责。1995年，我又到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了一年。直到1996年下半年回国，才开始真正接手主持安阳队工作。然而即使从1996年算起，我在安阳殷墟工作的时间也已有12年之久。

在所有我工作过的地方，最难忘的仍然是安阳。

正是由于有了在安阳工作的机遇，我得以做成了五件事：

(1) 与同事们一道发现了洹北商城。这座迄今所见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都城遗址，对于推动商代考古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2) 基于安阳的考古材料，在学术界提出了“中商文化”概念，使得商王朝的编年框架得以更加完整。自己作为主要执笔者参与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成果一等奖）一书即依据中商文化概念，采用了早、中、晚商的分期框架。

(3) 提议并在国家文物局、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市人民政府全力支持下，建成“殷墟博物馆”，主持完成的殷墟博物馆“殷墟珍宝展”获2007年全国博物馆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

(4) 提议并在国家博物馆、社科院考古所支持下，促成“司母戊鼎”回安阳展出。

(5) 参与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过程。在殷墟遗址的价值认定、价值保护、价值展示以及陪同联合国ICOMOS考察员考察等环节做了应做工作。殷墟于2006年7月13日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于我在安阳的工作，地方政府和人民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05年，安阳市举办“感动安阳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我居然以得票最高当选。2006年，河南省政府授予我“河南省政府一等功”。

我的科研工作是与我的田野活动相关联的。从1993年开始直到今天，我在各类刊物（包括英文、日文刊物）发表的文章共80余篇。大部分与“商研究”有关。这是因为商王朝的遗迹主要分布在河南。当然自己关注商代考古研究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压抑自己的其他兴趣。例如对考古学理论的爱好和对古代冶金术的关注，在我的研究中也体现。由于参与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关系，近年我开始对遗产学产生极大兴趣，连续撰写了多篇有关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方面的文章。2007~2008年，我甚至又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师从著名世界文化遗产方面的专家，曾经代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考察过我国龙门石窟的穆罕默德·姆格尔（M. Rafique Mughal）教授专门修了一门世界文化遗产管理（International Heritage Management）的课程。

本论文集所收录的文章，即主要限于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商研究、铁器冶金术、文化遗产这四个领域。所选33篇文章中，27篇已经发表过，另6篇是新近撰写的文章。

理论思考方面的文章共9篇。有梳理或评论西方考古理论的文章，也有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商研究是我考古生涯中用力最多的领域。这一领域的文章共18篇，包括14篇论文和4篇简报。按理说，论文集是不收录简报的，但在我所从事的商代考古研究过程中，这4篇简报却无法排除在外。这四篇简报与其他多篇论文一起，是我提出和论述“中商文化”的一个完整思路的反映。

“中商文化”从考古学而言，是一个联结殷墟文化与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的概念。认识到殷墟文化与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年代上的“缺环”，是自己读硕士的时候，在1993年发表的《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原载《考古》1993年10期）一文中，我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研究商文化，实际上是在研究一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整体。如果放到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考察，我们认为，殷墟一期早段文化的整理，尚有其特殊的学术意义。多年来，年代上大体与殷墟文化一期早段相当或略早的商代遗存，在豫北冀南一带频频发现，例如邢台曹演庄遗址、藁城台西遗址、安阳郭村西南台遗址，甚至包括河南辉县琉璃阁遗址的部分商代遗存。但这些遗存一直未能引起学术界特别的兴趣。由于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发现，人们很自然地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和殷墟。然而在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作为王都被废弃之后，殷墟辟为都城以前，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商文化。如果文献记载可信的话，这段时间还对应着几次王都迁徙的历史。相、邢、奄究竟在什么地方？除了对文献的推敲，更需要通过考古发掘和考古研究的手段去论证。商文化的发展史是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我们没有理由忽视其中任何一部分。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迟早是要补上的。殷墟一期早段不仅年代确凿，文化特征也已经比较清楚，今后定能在有关的学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我当年的硕士论文中，我甚至说过这样一段话：“要填补介于殷墟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缺环，可望在豫北冀南地区取得突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

是否存在一个“中商阶段”，最终还须在田野工作中解决。1997年，我在考古研究所领导支持下，与美国学者拉普教授和荆志淳先生开始了洹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最终于1999年发现属于中商时期的洹北商城，并于2000年和2001年发掘了洹北商城内的宫殿宗庙建筑，从而确认“洹北商城”为商代中期的一处都邑。

本论文集中，下述几篇简报和论文自成一组：

《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原刊于《考古》1998年10期；

《1997年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简报》，原刊于《考古》1998年10期；

《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商遗存与盘庚以先的都城迁徙》，原刊于《三代文明研究》，1998年；

《中商文化研究》，原刊于《考古学报》，1999年4期；

《洹北商城的发现与初步勘探》，原刊于《考古》2003年5期；

《洹北商城宫殿区1号基址发掘简报》，原刊于《考古》2003年5期；

《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原刊于《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该文曾以英文发表，篇名为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chaeological Chronolog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of Early Bronze Age China. 载 *The Review of Archaeology*, 22 (2) : 35-47 (USA); 《安阳殷墟宫庙区简论》，见《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2004 年。

有同仁评论说，这组文章可以作为“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进行考古研究”的典型范例。这样的评议，虽然让我羞愧难当，但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进行研究，的确是我们田野工作者应该坚持的。

论文所涉及的商代考古学问题，还包括殷墟文化的年代学问题、商代祭祀问题、江西赣江流域青铜文化与政治格局问题等。我的博士论文是以数理统计的方法研究商代社会组织的，没有包括在内。

研究冶金术是我的兴趣所在。论文集中收录了这方面的文章共 3 篇。其中《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的生产应用与社会发展进程问题》原系对白云翔先生专著《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所写的一篇书评。但文章内容涉及当前铁器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故也收录在内。

有关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 3 篇文章中，《殷墟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认知、保护与展示》一文是对为期 5 年的殷墟申遗工作的总结，其中部分内容公开发表过。《立足遗址“核心价值”，大力推广文化景观建设》一文是自己近年对考古遗址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思考的结果。

我从事田野考古工作的 20 余年中，得益于许许多多前辈学者的悉心指导。我首先想感谢三位恩师。第一位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伯谦先生。李先生是我国商代考古学领域最有成就的学界泰斗之一，也是我在北大求学时的老师。正是他引导我走向了商代考古的道路。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硕士导师郑振香先生。郑先生为人磊落，公正刚直，她以身教授予我许多东西。我在中商文化领域有所建树，也是从她指导我撰写《殷墟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关系》一文开始的。第三位要感谢的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UCL）的史蒂芬·申南（Stephen Shannan）教授。这位英国绅士永远那么谦和厚道、彬彬有礼。他教我学习西方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悉心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让我开阔了视野，使我在田野考古工作的实践中能够找到一些思考问题的新角度。

除了 3 位业师之外，我最应该、最想感谢的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荆志淳教授。荆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多年的学术合作伙伴。荆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帮助我，同时也是我一直在考古工作第一线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荆先生每年从国外来到安阳，我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他教给了我许多新的知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坦率地说，没有荆先生的参与，洹北商城的发现也是不可能的。

还有几位比我年长的学者，但我视为朋友。他们对我帮助很大。一位是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刘庆柱先生。在我担任安阳考古队队长的时候，不仅放手让我工作，还为我排忧

解难。一位是我刚到考古研究所时带领我走向田野的首位“领导”，考古队长吴加安先生，他使我感受到了首次加入考古队的快乐。一位是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从他身上我学会了许多东西。还有一位是刘忠伏先生。他以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使我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我在考古研究所多年，他们三位对我的关怀，总是萦绕在心。

过去的20余年中，殷玮璋先生、杨锡璋先生、高炜先生、乌恩岳斯图先生、高天林先生、刘一曼先生、王巍先生、陈星灿先生、杜金鹏先生，以及岳洪彬、何毓灵、岳占伟诸同事，均是难以忘记的良师益友。崔良生先生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我在安阳工作期间，他对我帮助最大。论文集编辑过程中，我的学生侯卫东付出了许多心血。这些都是我需要由衷感谢的。

我愿意以最真诚的心，感谢我的妻子张烨女士。她知书达理、宽厚善良、体贴细致。在我人生不甚顺畅的时候，她出现并且陪伴在我身边，默默支持我的工作，使我能够在考古学领域有所作为。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科学出版社的闫向东先生、孙莉女士和曹明明女士。向东是我在北大的同门，除了支持我的工作，更多的是对我工作的理解。孙莉和曹明明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为我的论文集奔波忙碌。没有他们的努力，这本论文集不可能这么快付梓。



目 录

自序	(i)
----------	-----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被阅读的历史与被感知的历史	(3)
考古学·民族主义·证史倾向	(9)
作为考古学的考古学	(17)
欧美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与所谓“理论流派”	(20)
傅斯年与中国早期考古学	(38)
殷墟早期田野工作的得失	(44)
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延滞现象和“边缘化效应”	(49)
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问题与中国文明进程的基本估计	(53)
重建公元前 16 ~ 前 11 世纪中国史的过程及其经验	(59)

商 研 究

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	(71)
1997 年安阳洹北花园庄遗址发掘简报	(86)
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	(104)
豫北冀南地区的中商遗存与盘庚以先的商都迁徙	(117)
中商文化研究	(128)
安阳殷墟保护区外缘发现大型商代城址	(158)
洹北商城的发现与初步勘察	(160)
洹北商城宫殿区 1 号基址发掘简报	(178)
商王朝考古学编年的建立	(187)
安阳殷墟宫庙区简论	(205)
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	(213)
殷墟家族墓地初探	(230)
殷墟商代墓葬出土海贝的统计学分析	(239)

殷商时期的“落葬礼”	(250)
姬家屯遗址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与商代安阳地区的气候变化	(260)
殷墟玉器的发现与整理	(269)
商时期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格局	(279)
二十世纪英文刊著中的“商研究”	(290)

铁器与冶金术

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	(321)
中国古代的铁三足架	(335)
先秦两汉时期铁器的生产应用与社会发展进程问题	(342)

文化 遗产

立足遗址“核心价值”，大力推广文化景观建设	(355)
追踪殷墟文化的世界意义	(361)
殷墟遗址“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认知、保护与展示	(364)

考古学理论与方法

被阅读的历史与被感知的历史

2003年8月8日，笔者与一名考古学家和两名地质学家同行，前往太行山东麓河南境内的丘陵地带调查。在安阳市西北约25公里处的漳河岸边，我们找到一个名叫渔洋的小村庄。该村依水临峰，风景秀丽，现有人口约3200人。

我们驾驶着切诺基汽车从南往北向村庄靠近。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一片红砖砌起来的房舍，多数是两层建筑，还有一些尚在建设中。正在轰鸣的搅拌机和停靠在一旁的摩托车展示出当代社会的生机。一堵尚未拆除的旧院墙上，朱红色的标语“毛泽东思想万岁”留下了“文革”岁月的痕迹（图一）。

汽车穿过狭窄的小路将这片房舍抛在后面，前面忽然出现一座拱形门洞。平卧叠砌的青砖和门洞上的粗大老树足以说明这不是当代建筑。在门洞旁，我们找到一方嵌在青砖中的石碑。上面清晰地刻有“乾隆五十五年”字样。细阅碑文，获知拱形门洞最初是明代所建（图二）。这样的拱形门原有4个，分别建在村庄的东、南、西、北。



图一 渔洋村中发现的“文革”时期的标语



图二 渔洋村中明清时代的拱形门洞

我们将汽车停在拱形门洞外徒步进入了村庄。尽管村中的“美容美发”广告不断提醒大家如今已是2003年，但脚下的石板路却将我们导向了爱新觉罗氏时代和朱明王朝。我们来到村庄的东部。这里有大片青砖瓦房。有的早已坍塌成为残垣断壁，有的显得年久失修，少数几间还住着人。复杂的结构和雕梁画栋诉说着原来主人的身世。嵌砌在一截断垣中的两方拴马石足见主人原是村中的大户人家。几处门楣上，我们读到“致中和”、“耕且读”的字样，字迹饱满遒劲，似乎暗示这片房舍或许也出过“范进”之类的读书人。

沿途有村民好奇地打听我们的身份。得知是考古队时，一名村民很快抱出一件酱色的金元时代的瓷罐打算出售。在村庄的北部，我偶然发现地下埋藏着几片白瓷片。用 Marshalltown（美国品牌的手铲，为考古队员所喜爱）挑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宋代的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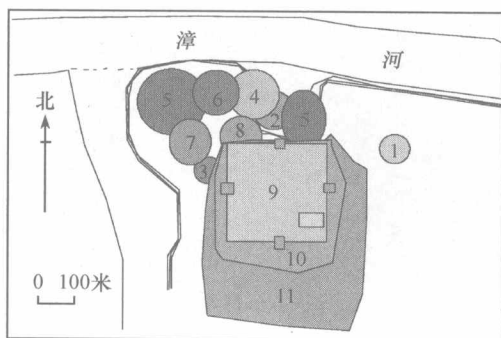
最让人吃惊的发现是在村后。

一处长满荆棘的地点，同事们发现地层断面上隐约有红色的烧土出露。用铁锹铲开荆棘，“哗啦”一声掉出两块大黑瓦。这种黑瓦无论质地还是造型，都与隔河相望的河北临漳县出土的东魏北齐都城遗址中的黑瓦完全一样。

汉代的遗迹也在路旁暴露出来。我们没费什么力气便采集到几块巨大的汉代印纹陶缸残片。附近捡到的还有两件典型的战国高柄豆。这两件灰色的陶豆可能是被人从不远处的战国地层中带到这里的。仅仅只有几步之遥，我们又从断崖上找到两件典型的晚商袋足鬲。这一发现证明 3000 年前这里是商王朝辖地。

然而商代陶鬲远不是本地年代最早的文物。漳河岸边采集的标本还有带花边口的下七垣文化陶罐残片，底部有密集算孔的龙山文化陶甗片以及典型的仰韶文化陶片。这些遗址无一例外地分布在村西北，与当代渔洋村浑然一体（图三）。

整个渔洋村调查只有一天。步履从当代开始，途经清、明、元、宋、东魏北齐、汉、战国、商、下七垣、龙山时代，最终止于仰韶时代（图四）。



图三 渔洋遗址不同时代遗迹分布图

1. 仰韶文化 2. 龙山文化 3. 下七垣文化 4. 商文化
5. 春秋战国文化 6. 汉代文化 7. 北朝文化（东魏北齐） 8. 宋元时期文化 9、10. 明清 ~ “文革”时期 11. 当代



图四 渔洋遗址中采集的部分文物

这是穿越历史之旅。

我们用一天的时间，触摸和感受了一部非文字形式的村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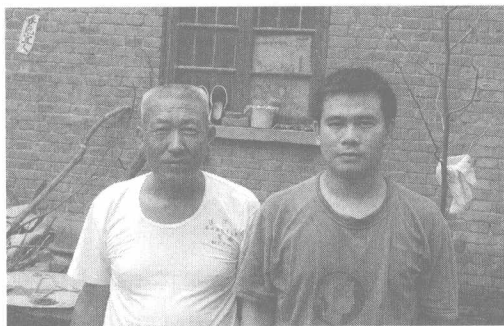
当考古学者忙于绘图、记录、收集标本的时候，同行的两名地理学家却试图就一个问题给出答案：为什么千百年来始终有人钟情于这方土地？

我却总想了解这座村庄的历史地位。比方说，这个不起眼的村庄在华北平原不同时期的社会体系（比如说商朝）中分别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呢？

提出这样冷静与理性的问题，显然来自各自的学术习惯。

然而对于当地村民龙振山来说，却没有这般冷静和理性。他对这部穿越时空的活历史充满深情和眷恋。

在龙振山的家中，我们看到他早年花 100 元收购的本村清代私塾的牌匾。他将这件牌匾珍藏在家里的一间上房中。他告知我们，他决不会将这件牌匾出售（图五、图六）。



图五 笔者与龙振山（左）



图六 龙振山收集的“读书声”牌匾

龙振山还从自己的床板底下和儿媳的床板底下寻出十余个硬纸包装箱。箱中装的全都是他历年来收集的本村文物。有明代青花、北齐泥像、汉代耳杯、战国鼎壶、商代陶鬲、龙山卜骨和仰韶石器。

龙先生能随口说出所有这些文物的采集地点。比如卜骨出自本村“某某家的地里”，玉器出自“某某家屋后”。

他说如有可能，他要搞一个“村史博物馆”。

在我看来，龙振山的朴实语言触及了“如何编撰历史”的学术问题。

历史记录似乎可以分为两类：基于文献的历史记录和基于考古实物的历史记录。

第一类可举出二十五史为例。这种记录所展示的历史的系统性是不可比拟的。但这种记录存在“扭曲”历史的可能，因而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客观历史”。这一点已为诸多学者指出。由于其载体是文字形式，这种记录注定只能被“阅读”（本文的阅读一词取其本义，与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者使用的“Read”一词不完全相同）。读者从中获取的历史知识既受本人素养和知识背景的影响，同时也受“历史编撰者”的影响。

第二类历史记录，渔洋遗址可以作为一个例子。与文献历史记录不同，渔洋式的“历史记录”常常没有文字资料备查。这种历史记录是零碎的、片断的，但却是鲜活的。在被考古学家进行“整理”并纳入“系统的历史知识”之前，它是客观存在，资料本身并不存在对历史的“扭曲”。公众对这种历史的最直接的认识方式不是“阅读”，而是通过感观去观察甚至“触摸”。只有在考古学家“整理研究”后，这种历史才转化为可以“被阅读的历史”。

根据两种历史记录的特性，我们试着讨论与“历史编撰”学相关的两个要点。

1. 作为公众与历史知识的中介的“历史编撰学”

“历史编撰学”其实是一种处理历史记录的方式，并且只是方式之一。对于文字式历史记录，“历史编撰学”需要甄别史料（所谓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按照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警示，当然也要不断反省研究者的背景以及所建构的历史知识体系本身。对于“渔洋式历史记录”，历史编撰学常常要由考古学家做先期工作，或干脆由考古学家直接代劳。

“历史编撰学”是重要的，它充当的作用是公众与历史资料之间的中介。大多数情况下，公众通过历史学家“编撰的历史”与历史记录或资料发生关系。必须指出的是，“历史编撰学”并不能完全替代公众去与历史的关系。考古学家整理遗址和遗物之前，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感观认识历史。龙振山式的“历史观”不建立在任何历史学家的知识体系之上。除了考古学编年知识外，他对历史的理解并未借助于“历史编撰学”。他对渔洋村的历史资料所浸透的情感更是“历史编撰者”不能提供的。

因此历史编撰学不是万能的。让公众自己从历史资料中求解答案和寻找个人的体验，应该同样被尊重。这一做法保留了解读历史记录的丰富性。

2. 两种历史知识的整合

对于许多考古学家来说，考古学可以提供独立的知识体系，即考古学可以独立于历史学之外。比如编撰史前史的任务基本上划归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通常是不参与的（到底应该不应该参与和什么时候、在何种话题参与，也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渔洋式历史记录”与“史前遗址”仍然有一定区别。纯粹的史前考古遗址作为研究“史前史”的基本资料不仅没有文献记录相印证，甚至没有“历史参照体系”。“渔洋式历史记录”包括一部分历史时期的遗存。历史时段的遗址虽然资料本身也是独立的，但他们具有一个由文献记录提供的“背景”。因此“渔洋遗址”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史”的资料，它的一些内容可能放在文献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理解。

从理论上说，当同一历史事件既有文献记录，又有考古记录的时候，二者的“解